

# 論中國多統時期的一個特色

劉家駒

## 一、前言

記得在「論中國歷史上的一統」一文中（刊於本刊第二十期），曾經提到中國歷史上的五個多統或分裂時期，她們分別是：戰國時代、三國時代、東晉南北朝、五代十國和南宋、遼、金。

我一向不太重視中國歷史上的多統或分裂時代，其中一個很顯明的理由是：那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變態時期。再者，舉凡多統或分裂時期，所發生的事跡紛雜，頭緒萬千，很難理出一個眉目來，因此，總是避而不去接觸。可是，近年來的興趣，似乎逐漸轉向多統或分裂的歷史方面。然而，仍有力不從心之感。茲就最近讀史的一點心得，寫出來供讀者指教。

多統或分裂之所以造成的原因很多，可是大體分析起來，似乎可以歸為五大類。一是思想的紊亂；二是異族的侵擾；三是軍權的割據；四是原有當政者的腐敗而不知改進與應付；五是權力轉移所發生的缺點。

所謂思想的紊亂，在過去歷史中，却產生了很大的衝擊，由於信仰不同的思想理念，就排除其他一切的思想理念，造成思想方面的壓力，便很容易與權力勾結，做成歷史的離心力。假如思想方面給予自由發展，和而不同，却可避免混亂中挺而走險。

所謂異族的侵擾，隋唐以前的中國歷史，雖然造成了分裂或多統，但總會又同化於中國的傳統固有文化中，並沒有造成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悲劇。但自隋唐以後，特別是蒙古入主，影響中國文北元氣不少，但蒙古之國祚亦短。因此，當滿族入主後，雖為異族，然終得吸取中國文化以延長其統治二百有六十三年。

所謂軍權之割據，亦即是地方軍，擁地自重，相互推擁，不絕如縷。史家常稱：文人所造成的是門第，武人所造成的是割據，各佔中國歷史的一半。是耶非耶，姑存而不論。

所謂當政者之腐敗，不知改革與應付，或許由於經歷長時期的因循苟且所產生的必然結果。特別是擁有權力的人，時間一久就造成「權力最敗壞人性」的後果。

所謂權力轉移所發生的缺點，恐怕是中國歷史上的最該思考的問題，特別是在目前中國又處於分裂的時代。如果不能在權力轉移上規劃出一個可行而理想的制度，統一的時代不會來臨，即使是真的統一了，仍然會存在着強烈的分裂或多統的因素。這方面確已有人開始在深入討論了，可惜的只是限於學術、思想自由地區而已。無論如何，如果想在中國的歷史上不再出現多統或分裂的話，上述的五種導致分裂或多統的因素，却是該設法消除淨盡和加以改進才行。否則，天下終將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了。

以上只是概畧的敘述，囿於題目不再作深入的考察。就算做是這篇的引論吧！

## 二、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

假如我們平心靜氣的對中國歷史上的多統或分裂時期加以研討的話，雖然每次導致多統或分裂的原因各異，但在總結過去中國歷史上五個不同的時代的話，我們不難發現她們似乎都有着幾個共通的特色。所謂特色，並不意味着要肯定或否定她們的價值；或是對這些特色給予贊成或反對，只是把這些特色的事實勾劃出來而已。假如我們從這一方面來看的話。起碼有以下的幾個特色：

- 一、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；
- 二、中國版圖的擴充與文北的傳播；
- 三、新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的建立；
- 四、人民生活流離失所與無安全感；
- 五、書籍文物的破壞與摧毀；

## 六、容易引起外國外族的覬覦。

現在只論多統或分裂時期的一「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」。所謂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並不同於人才鼎盛，同時，也不次於人才鼎盛，只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的人才，在多統或分裂時期，更容易突出，而突出地多樣化而已。我不否認在中國歷史上，一統的時代，人才却也是鼎盛的，不過，由於國家規模的鞏固，各種制度業已建立，大多數的人才都會循着一定的軌道而出現，雖然人才也會有多方面的發展，但是這發展一方面來自政府的倡導，範圍不會太廣；另一方面這發展的步調，也不太為社會大眾所注意。可是，在多統時期就不然，各式各樣的人才似乎都能突出表現出來，同時也為社會大眾所矚目，或許更確切地說，這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正是反映了社會大眾的民族活力。特別是在政統紊亂陷於多統之時，更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的煥發與創造。

很多史學家都認為：經過了中國歷史多統時期的紊亂與不安，而中國更能創造出一個更光輝、更燦爛的一統時代，其基本的原因乃是證明中國文化特質的優越性，堅忍性和包容性。然而，造成一統時期的光輝與燦爛，如果我們不能從多統時期的人才方面加以注意的話，恐怕不容易發現到中國文化特質的優越性、堅忍性和包容性的具體表現。以及他們對將來統一的貢獻。

同時，從中國歷史多統時期的人才多樣化與突出化上，我們可以了解中華民族在面對政治與社會的變化與激盪中，如何自處與如何表現，同時也表現出他們對國家、民族、政治與社會的看法與觀點。以及他們對人生的了解上，更能加深一步。當然，我無意對多統時代人物的作風加以月旦，起碼，他們的作爲却會發人深省的。由於時代的不同，我們只能探討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背景，以及他們的不同作爲而已。

## 三、戰國時代的游士與游俠

戰國時代的游士行徑，任何讀中國歷史的人都耳熟能詳，他們分屬於不同的學派，像儒、道、墨、陰陽、法、縱橫、農、名、雜等家，到處游說諸侯，以爲他們所懷的是唯一救國救世之術

。沒有當時的國界限制，並且與各國諸侯並列而坐，大談他們的治國理想。只要有諸侯可以應用他們的學說的，他們便不惜委身事之，這委身事之的最大原因，不來自諸侯的權威，而是來自他們所擁的理想。如果諸侯不能實行他們的理想，他們毫不灰心地去前往另外其他諸侯國，企圖以他們的理想來影響各諸侯國，並且促其實現他們的理想。可以這麼說，這些游士是向上流社會中加以進行游說的，只強調他們的理想之實現，並不理會到個人的貴賤榮辱的。從這方面來看，這是一個百家齊鳴，政治開放時代。春秋左傳有着豐富的記錄。

對於游俠，則是表現了另一形態，他們是在社會中下層的。司馬遷的史記，似乎有意特別突出社會上的游俠作爲。在孟嘗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和春申君的列傳中，表達的最爲清楚。這四位公子都是以養門下食客爲著名的，同時也都是擁有數千多人，只要有一技之長的各色人等，也都爲容納的對象。

四位公子之所以能容納這麼多人，而這些游俠也願前來歸附，最主要的一個條件是得有尊重游士的量和與游士同甘共苦的不平等，那麼這些游士便會不惜犧牲的爲四位公子賣命。

平原君的傳記中，有這麼一段記錄，就是表示尊重的重要：「平原君家樓臨民家，民家有躡者，繫散行汲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，臨見大笑之。明日，躡者至平原君門請曰：臣聞君之喜士，士不遠千里而至者，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。臣不幸有罷癯之病，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。臣願得笑臣者頭。平原君笑應曰：諾。躡者去，平原君笑曰：觀此躡者，乃欲一笑之故，殺吾美人，不亦甚乎？終不殺。居歲餘，賓客門下舍人悄悄引去者過半。平原君怪之，曰：勝所以待諸君者，未嘗敢失禮，而去者何多也。門下一人前對曰：以君之不殺笑躡者，以君爲愛色而賤士，士即去耳。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，自造門進躡者，因謝焉。其後門下乃復悄來。」（史記卷七十六）

在孟嘗君傳記中，有這麼一段話，強調平等稱：

「孟嘗君在薛，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，皆歸孟嘗君。孟嘗君舍業厚遇之，以故傾天下之士，食客數千人，無貴賤一與

文等。……孟嘗君曾待客夜食，有一人蔽火光，客怒，以飯不等，輟食辭去。孟嘗君起，自持其飯比之，客慚自剄。士以此多歸孟嘗君。孟嘗君客無所擇，皆善遇之。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。」（史記卷七十五）

假如我們能從司馬遷筆下所出現的游俠人物如狗盜鷄鳴之徒，馮驩、毛遂、侯嬴、朱亥、朱英等人，就可以了解戰國時代來自社會各方面的人才是多麼的突出了。因此，司馬遷在「游俠列傳」的開始，就對戰國時代的游俠給予極大的憧憬說：

「韓子曰，儒以文亂法，而俠以武犯禁。二者皆譏，而學士多稱於世云。至如以術取宰相大夫，輔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於春秋，固無可言者。及若季次原憲，閭巷人也。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，義不苟合當世，當世亦笑之。故季次原憲，終身空室蓬戶，褐衣疏食不厭，死而已。四百餘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俠，其行雖不軌於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。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蓋亦有足多者焉，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。……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，久孤於世，豈若卑論儕俗，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。而布衣之徒，設取予然諾，千里誦義，爲死，不顧世，此其所長，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窮窘而得委命，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。誠使鄉曲之俠，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，效功於當世，不同日而論矣。要以功見言信，俠客之義，又曷可少哉。古布衣之俠，靡得而聞已。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親屬，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賢者，顯名諸侯，不可謂不賢者矣。此如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，其勢激也。至如閭巷之俠，修行砥名，聲施於天下，莫不稱賢，是爲難耳。然儒墨皆排擯不載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俠，湮滅不見，余甚恨之。」（史記卷一二四）

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人人才多樣化與突出化的偉大時代。也就是爲此，歷來的史學家也多以戰國時代爲不可多得的時代，起碼在人才智慧與言必信和行必果上。

#### 四、三國鼎立的三種用人方式

三國時代的經過，由於「三國演義」的通俗小說的流行，也爲中國人們所樂道。同時，也覺得又是中國歷史上的人才多樣化與突出化的時代。這當然與羅貫中的寫作天才有極大的關係，使得三國時代的人物栩栩如生。

趙翼的「廿二史劄記」卷七，有「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」一條，就已注意到三國時代的人才鼎盛。該條云：

「人才莫盛於三國，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。故得象力相扶，以成鼎足之勢。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：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，劉備以性情相契，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，後世尙可推見其心跡也。」

曹操、劉備與孫氏兄弟之用人方式之不同，蓋來自各自的性格。假如我們檢閱一下「三國志」對這三人的性格描述，就會洞悉其情。

陳壽筆下的曹操，已經可以給我們一個清晰的概念：「太祖少機警，有權數而任俠。放蕩不治行業，故世人未之奇也。」（魏志卷一）然而，裴松之筆下的曹操，更能用具體的事實來做注釋：「曹瞞傳云：太祖少好飛鷹走狗，游蕩無度，其叔父數言之於嵩，太祖患之。後逢叔父於路，乃陽敗面喞。叔父怪而問其故。太祖曰：卒中惡風。叔父以告嵩。嵩驚愕呼太祖，太祖口貌如故。嵩問曰：叔父言汝中風，已差乎？太祖曰：初不中風，但失愛於叔父，故見罔耳。嵩乃疑焉。自後叔父有以告嵩，終不復信。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。」（魏志卷一裴注）

曹操雖然以「權術相馭」，但是當人才們發現了他的野心與權術之後，却多離他而去。如田疇在軍事上的建樹與策劃，而大破胡虜。但在論功行賞之時，田疇堅辭不受。所有賞賜，田疇也都分散給宗族知舊。因此，「太祖追念疇功殊美，恨前聽疇之讓。曰：是成一人之志，而虧王法大制也。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。疇上疏陳誠，以死自誓。」曹操心仍不死，知道田疇與夏侯惇爲好友，唆使夏侯惇前去規勸。結果田疇再表明心跡說：「若必不得已，請願效死。刎首於前，言未卒，涕泣不已。惇具答太祖。太祖喟然，知不可屈。」（魏志卷十一田疇傳）

最出名的恐怕是先助曹操而後不值曹操所爲的荀彧了。曹操之得荀彧，以爲是自己的「子房」，所有曹操的計劃，也多是出自荀彧的參謀，荀彧傳中就有這樣的描述：「奉迎天子都許。天子拜太祖大將軍，進彧爲漢侍中，守尚書令。常居中持重。太祖雖征伐在外，軍國事皆與彧籌焉。……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勛。密以諮彧。或以爲太祖本興義兵，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，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。」（魏志卷十荀彧傳），結果荀彧稱疾不再協助曹操。但據裴之注云，荀彧是被曹操害死的。曰：

「魏氏春秋曰：太祖饋彧食，發之乃空器也。於是飲藥而卒。……或別傳曰：或自爲尚書令，常以書陳事。臨薨，皆焚毀之，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。」

因此得知，用人而以權術，總不能持之久的。不過，曹操之三下「唯才是舉」的「求賢詔」，可見當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少。

劉備的性格與他用人的方式頗相符合。三國志蜀志卷一中說：「先主不甚樂讀書，喜狗、馬、音樂、美衣服。……少言語，善下人，喜怒不形於色。好交結豪俠，年少爭附之。」

這點，我們可以從劉備與諸葛亮結識與關係中看到。劉備能夠「三顧草廬」，使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」的諸葛孔明出山，若非「性情相契」是不能做到的。雖然由於劉備與諸葛亮的過從太密，而引起關羽張飛等的不愉快，可是，劉備仍能「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」（蜀志卷五諸葛亮傳）來平息關羽、張飛等的不悅，也算得是真正的「性情相契」了。也就是爲此，在劉備臨終之時，才能說出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。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而諸葛亮也竟能「敢竭股肱之力，効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」了。

孫權性格的刻劃是從裴松之的注中得來的。

「江表傳曰：堅爲下邳丞時權生，方頤大口，目有精光。堅異之以爲貴象。及堅亡，策起事江東，權常隨從。性度弘朗，仁而多斷。好俠養士，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。每參同計謀，策甚奇之，自以爲不及也。」（吳志卷三裴注）這恐怕就是孫權何以要

用「意氣相投」來吸引和利用人才了。

趙翼對劉備與孫權之能得人才，專在一個「誠」字，於是說：「惜是時人才已爲魏、吳二國收盡，（蜀）故得人較少。然其第一流人，二國俱不能得，（劉）備獨能得之，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。至於孫氏兄弟之用人，亦自有不可及者。……周瑜薦魯肅，權即用肅繼瑜。……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。權曰：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，子瑜不負孤，猶孤之不負子瑜也。」（廿二史劄記卷七）這與曹操的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」的態度，不知相差幾千萬里呢！

## 五、東晉南北朝的隱逸人才

通常我們談人才，似乎只着重於有表現的人才，特別是在政治上表現的人才。對沒有表現的人才，或是不願在政治上有表現的人才，總會不太注意。然而，在東晉南北朝時代，這種沒有表現，或是不求表現的人才特多，而也能在青史上留名，那麼就知道他們却也是這一時代的人才，只不過所表現的或者更好說所突出的是向另外一種境界。

假如我們只稍微翻閱一下這一時期的史書，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時代的特殊情形，大多數真正的人才，都走向了隱逸的一條路。這裏可以列出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，供大家參考。

- 一、晉書卷九十四有隱逸列傳，共載三十八人。
- 二、宋書卷九十三有隱逸列傳，共載十八人。
- 三、南齊書卷五十四有高逸列傳，共載十二人。
- 四、梁書卷五十一有處士列傳，共載十二人。
- 五、魏書卷九十有逸士列傳，共載四人。
- 六、南史卷七十五至七十六有隱逸傳，共載三十一人。
- 七、北史卷八十八有隱逸列傳，共載六人。
- 八、陳書、北齊書與周書則付之闕如。

從這一簡單的統計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東晉和南朝的宋、齊、梁各朝，隱逸的人才較多，而後逐漸遞減，到陳朝已經不見史傳。而北朝除魏書之四人外（或北史的六人，其中有三人如眭夸

、馮亮、鄭修與魏書同），北齊與北周書則不見史載。因此，我們就很容易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。由於曹魏之篡位與司馬氏的再篡，人才多不願與政治現實接近，於是清談之風大盛，繼之而隱逸山林，不問俗務。雖然有人以爲「清談誤國」，但面對當時的政治現實與權力轉移的不光明、不磊落，人才是不願同流合污的。及至晉室南渡後，門第所支持的政府腐化頗深，第一流之人才只有隱逸，因此才有以後的異族入政府之事，這是當時南朝的情形。

至於北朝則否，特別是魏孝文帝之強烈漢化要求，使到留在北方的士族人才，除力圖自保外，同時也盡量保存及宣揚漢族文化，因此只魏書所載四人爲逸士，以後則無。而魏書所載逸士四人的隱逸原因也不相同，像眭夸其人，則是懷有悲天憫人之志，不求聞達免得影響自己的忠誠，便與酒爲伍，頗有魏晉遺風。李謐則爲經學大師，以周孔爲主的嚴謹地守住家法，一絲不苟。馮亮却是深受佛理的薰陶，而看破紅塵；鄭修本人却是生性喜歡與大自然爲伍，不落俗務。（以上均見魏書卷九十本傳。）

因此，李延壽說：「詩云：皎皎白駒，在彼空谷。禮云：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諸侯。語曰：舉逸民，天下之人歸心焉。雖出處殊途，語默異用，各言其志，皆君子之道也。」又說：「古之所謂隱逸者，非伏其身而不見也，非閉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智而不發也。蓋以恬淡爲心，不嘔不昧，安時處順與物無私也。」（北史卷八十八隱逸傳）

不少的人不能理解「隱逸」之士就是人才。以爲是逃避現實與責任而已，這話當然很淺，假如我們能從這「隱逸」的外表籠罩下，發掘出每一位「隱逸」之士的內在才華與智慧，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却充滿了多樣化和突出化的。中國文化中的道家學說，自然而然的就會大派用場的。誰能說道家精神只有消極一面呢？而印度佛學中的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，又那是販夫走卒所可深入體會呢？

起碼，在東晉南北朝的時代，中國歷史上的人才，多走上了一條「隱逸」之途，却是值得玩味的。

## 六、黑色「五代十國」的一線曙光

歷代討論「五代十國」的人，對着這一時代都沒有好感，特別是歐陽修的「六代史」更是「嗚呼」滿篇，以爲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、最墮落的時代。

假如要從「五代十國」中，也能找出「人才多樣化和突出化」的特色，不啻是緣木求魚。

然而，我會記得查理·迭更斯在所著「雙城記」的序言中，有一段類似這樣的話：這是一個無信仰的時代，也是一個信仰的時代，這是一個嚴凍的冬天，也是和暖的春天；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；這是一個失望殆盡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。（手頭上無書，只畧記大意而已）。

因此，五代十國却也可以從這一方面來了解人才的多樣化和突出化。這裏，我可以舉出四件史事，以供讀者們品評。

一、私立書院制的創建——有唐一代私學不外三途，除私人講學和寺觀教育之外，就是大家族的家學。可是，在經唐末五代大亂時，大族私莊盡被摧殘，家門之學，漸爲帶有社會性之私人講學與寺觀教育所代替，由於寒族日益抬頭，急需教育，於是比較大規模之山林講學事業出現。例如，五代史上就記錄着有講肆的出現（五代史卷九十四高漢筠傳）以及中條山中的廬山白鹿洞書院之建立，時在南唐。另有睢陽書院、嵩陽書院及嶽麓書院之建立。周如所知，宋代書院的發展爲一大教育文化的私人事業，造福國家社會不少，然而，這類書院開其端者，則是始於五代十國時期。

二、印刷術雖較早發明，但到五代印刷書籍逐漸廣泛，根據五代史會要卷十八稱：書籍多保存於東南，此區蓋爲寒士的新土。同時，舊五代史卷十四稱：書籍亦多存於新起的武臣家中。可見此一時期文化傳播的轉變。

三、對繪畫藝術，五代十國的成都人黃筌多畫禁苑所有珍禽瑞鳥，奇花怪石；南唐徐熙多狀江湖汀花野竹，水鳥淵魚。史稱：「黃筌富貴，徐熙野逸」，樹立了宋代花鳥畫之兩大典型，亦

開藝壇畫花鳥之先河。

四、宋詞是著名的，但第一部詞集——花間集却是出自後蜀趙崇祚之手。而南唐後主李煜的詞，到現在還是人人樂讀，方興未艾呢！像：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，寂寞梧桐深院鎖深秋。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」該是多麼清冷突出呢？

因此，五代十國也並不是可以拔除人才的多樣化與突出化的特色呢！

## 七、南宋前後的疑經風氣

經過了隋唐的一統，大多數的中國人才多循科舉制度而上進。雖然科舉的科目時有轉變，先秀才，再明經，後舉人。可是，對於經書的死背、死讀，不敢有絲毫異見，却是縛束了不少的讀書人。然而，到宋代時風氣為之一變。王應麟「困學紀聞」卷八中，曾引陸游的話說：

「唐及國初，學者不敢議孔安國，鄭康成，況聖人乎？自慶曆後，諸儒發明經旨，非前人所及。然排繫辭（歐陽永叔），毀周禮（大程、小蘇）、疑孟子（司馬溫公、李泰伯），議書之胤征、顧命、黜詩之序，不難於議經，況傳注乎！」

這一疑經之風，蔚然而成，可以開出了中國人才的另一自由天地。所以，有的史學家就稱，這一時代的中國學術界，不啻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。也就因此，從宋開始，中國人步上了一個理學的時代和一個時代的時代。

在這一時期，人們不但要重溫傳統的學術，同時又要吸取新知識而加以調和；人們的意志不僅向上發展，以圖影響現實政治，同時，又向下降，以圖救濟現實人生。這一學術思想自由化的結果，產生了很多這一類的人物——而以身作則地來談世論道。

學友麥仲貴先生，曾著有「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」一書，民國五十七（一九六八）年由新亞研究所出版，厚四百五十頁。從中可得宋代理學家所表現在著述上的成績。

我之所以重視這一時期的人才，乃是在於打破歷來經學的約

束，從經學的註中解放出來，而使到經學及中國學術史更能發揚光大，同時，更使得這一時代的人才再次成為多樣化與突出化的，目前，很多的史學家們，都以為中國近代期該是遠溯到宋代的，因此，也特成立了國際間的宋史研究組，專門對宋代的一代加以研討。基本的原由是：他們肯定了宋代既是中國的「文藝復興」時代，何以不能與西歐的「文藝復興」時代並駕齊驅，走上同一條的道路。當然，這也可說明中西文化精神的本質的緣故。同時，我們可以指出來的是：西歐在文藝復興後，却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而達到目的境地，她們是：宗教改革，科學革命，思想革命、商業資本主義革命、地理發現和產業革命而成的。中國並沒有自己的宗教，科學天才雖有，但並不特別致力，同時，中國地大物博，根本無需向外擴張，同時，中國民族性與文化特質，向來就不大異於西方的。因此，也就不能與西方步調完全一樣，在歷史中發展了。

## 八、結語

以上只是一個粗淺的輪廓而已。實則，在多統或分裂時期，那只是中國政治實現上的一時紊亂與不一統而已，可是，在社會上與中國人身上，都仍貫徹着傳統文化的氣息，不時地有所發揮，有所振作，有所更新，有所創造的，這種來自社會民間的文化精神，却是不能加以忽畧的。

最近，大陸上的中共政權又再掀起了「批孔」運動了。有人解釋為權力的鬥爭，有人解釋為破壞中國文化，想把中國文化連根拔起。我却相信着：任何一種這樣的暴力行徑，都無法使中國文化消除淨盡的。因為，中華民族愈是在多統或分裂之時代，愈能使中國文化多樣化與突出化的。而中國社會上的文化潛力，又必能孕育出來多樣化與突出化的人才呢！

一九七三年聖誕節於香港知愷書齋

